

南宋刊單疏本

毛詩正義卷第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

勅撰定

鄭譜變風

山右

孔穎達等奉

名山堂

褒裳

丰

東門

子幹

揚之水

出於東門

野有蔓草

桑扈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
縣也正義曰據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

毛詩正義

〔唐〕孔穎達 撰

人民文學出版社



南宋刊單疏本
毛詩正義

〔唐〕孔穎達撰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唐)孔穎達撰.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410-4

I. ①南… II. ①孔… III. ①詩經—文學研究 IV. ①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256355 號

責任編輯 宋 紅
裝幀設計 何 婷
責任印製 史 帥

出版發行 人民文學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政編碼 100705
網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等

字 數 782 千字
開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張 33 插頁 3 彩圖 19 幅
印 數 1—2000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978-7-02-008410-4
定 價 160.00 元

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本社圖書銷售中心調換。電話:01065233595

出版說明

《毛詩正義》現存版本，以日本藏宋刊單疏本爲最優，其餘諸本均從單疏本衍生。蓋諸經義疏經北宋朝廷校訂，即有所謂單疏刻本，成爲後來所有注疏刻本的祖本。然諸經單疏北宋刊本，至今無一部流傳，而《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公羊》、《爾雅》六經有南宋覆刻本傳世；《儀禮》單疏南宋刊原本已經散佚，僅存清代覆刻本。在此七經中，《尚書》、《儀禮》、《禮記》、《公羊》、《爾雅》五經，有《四部叢刊續編》、三編、《古逸叢書續編》等影印本，《周易》有上世紀三十年代傳增湘影印本及臺灣重印本；唯獨《毛詩》，自一九三六年日本東方文化學院影印之後，多年未得重印，以致國內學者很少利用。

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國內已經不傳，我們徵得原書收藏者日本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的同意，據影印本做四拼一高清影印，并增添篇名目次及書眉篇名索引，以方便檢索；另增附四種含全彩印刷的《毛詩正義》古抄殘卷，讓讀者飽覽秘笈。這是本社繼《日本足利學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選》、《舊京書影》之後，從東瀛載回的第三種珍貴漢籍，現精心編輯，呈獻給讀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二〇一一年十月

毛詩正義卷第八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定

鄭譜變風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蘼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

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王

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諡亦云庶弟又文記年表云鄭桓公友

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

據一九九八年武田科學振興財團出版
杏雨書屋圖錄轉載

毛詩正義卷第九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勅撰定

齊譜變風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

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

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如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

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

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

始居者略季荊薄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郊子曰我高祖

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

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鷩故為司寇王盜賊以此知

爽鳩氏當少皞之世少皞以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故爽

總目錄

影印前言·····	李霖 喬秀岩 〇〇一
-----------	------------

解題匯錄

一、島田翰古文舊書考·····	〇一九
二、嘉業堂叢書翻刻本劉承幹跋·····	〇二二
三、東方文化叢書影印本出版說明·····	〇二三
四、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	〇二四
影印南宋刊單疏本毛詩正義	

目次·····	〇二九
---------	-----

正文·····	〇三七
---------	-----

附 古抄本毛詩正義殘卷四種

敘錄

甲、影印本羅振玉跋·····	四八九
天理本圖錄解題·····	四九〇
乙、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	四九一

丙、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	四九一
許建平敦煌古籍敘錄·····	四九二
丁、影印本長澤規矩也跋·····	四九四

圖版

甲、日藏抄本殘卷第一種	
秦風小戎十三行（高知大學藏）·····	四九五
秦風小戎十三行（天理圖書館藏）·····	四九六
秦風小戎二十七、蒹葭四十行（京都市藏）·····	四九七
秦風蒹葭十行（高知大學藏）·····	五〇三
乙、敦煌出土抄本殘片	
大雅思齊四行（俄藏 Дх.9328）·····	五〇四
丙、敦煌出土抄本殘卷	
大雅民勞三十七行（英藏 S498）·····	五〇五
丁、日藏抄本殘卷第二種	
大雅韓奕、江漢（東京博物館藏神歌抄背面）·····	五〇八

影印前言

李霖 喬秀岩

一、毛詩正義的歷程

(一) 南北學術的整合與毛詩正義的形成

縱覽南北史儒林傳，南北朝至隋代，學者輩出，各成一家之學，諸經義疏層出不窮，可謂一段經學蓬勃發展的時期。然義疏之學再向前推進，則不免出現脫離本旨、畸形發展之弊。錢穆撰兩漢博士家法考，末尾立「博士餘影」一章，說「博士家法，實不盡於兩漢」，引錄顏之推家訓、隋書房暉遠傳，謂「皆可見兩漢博士家法之餘影」，就是說南北朝義疏學的畸形發展，猶如兩漢博士家法章句之學。

顏之推云「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光陰可惜，譬之逝水」（顏氏家訓勉學篇），所論與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並無二致。「『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又與「秦延君說『曰若稽古』至二萬言」（太平御覽學部引桓譚新論）如出一轍。這種風氣不僅顏之推反對，隋代有一批學者都感到有必要糾正。王劭有一段話經常被引用：「魏晉浮華，古道夷替。洎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唯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議，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憤憤，鄭、服之外皆讎也。」（舊唐書元行沖傳錄元氏釋疑所引王劭史論）漢代經學學說的畸形發展，主要以章句的形式出現；東漢後期，何休、鄭玄等打破家法，不爲章句，而作解故、箋注；至魏晉，王肅、杜預等擺脫經學傳統的束縛，從更自由的立場解釋經文。南北朝經學學說的畸形發展，則主要以義疏的形式出現，其內容是對鄭玄、服虔等學說的理論研究，然研究愈深，脫離經書本義愈遠，跡同漢代家法章句。所以王劭批評當時佔多數的二三流學者爲「草野生」，並

尊崇王肅、杜預爲開創風氣的榜樣。

曾與王劭同修國史的劉炫、劉焯，各自鑽研經學，對南北朝義疏學進行了徹底的解構。劉炫、劉焯於諸經皆有義疏，後多散佚不傳。所幸二十世紀在日本發現劉炫的孝經述議，在此摘錄其中有關「仲尼居」的一小段：

江左朝臣各言所見：謝萬云：「所以稱『仲尼』，欲令萬物視聽不惑也。」——記云「孔子閒居」，何獨不慮惑哉？曾參若避「仲尼」，何以不稱其名而稱「子」也？車胤云：「將明一經之義，必稱字以正之。直稱『孔子』，恐後世相亂。」——然則諸稱「孔子」，豈可皆被亂乎？殷仲文云：「夫子深敬孝道，故稱字以說。」——然則名尊於字，若其深敬孝道，何以不自稱名？且諸賢等皆以孝經爲弟子所錄，此非夫子自稱，復何云「深敬孝道，稱字以說」也？

相關討論還很長，不啻顏之推所說「兩紙」。在此，劉炫——指出江南學者論說的不合理，頗有一點擡槓的味道。實際上，那些江南學者，本來沒有追求這種合理性。義疏學本來有自己的遊戲規則，現在劉炫故意忽視這些遊戲規則，大聲疾呼這些學說都不合理，不足取。還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劉炫只有在批評舊說的基礎上，才能提出己見，並非完全另起爐竈。劉炫對舊學說的批評導致了兩方面結果：首先，自然引起了學者們的反感。隋書儒林傳云「劉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時」，我們看到孝經述議之後，很容易認同這種評價。第二點更重要的是，儘管如此，劉焯、劉炫的合理主義學術批評，總體上還是爲當時的學界所接受，對唐初學術有最深遠的影響。所以隋書儒林傳說：「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措紳咸師宗之。」這說明南北朝義疏學的舊遊戲規則已經失效，而其具體成果已被轉型。

經學的南北整合，沒有在隋代完成，而要持續到唐太宗時期。太宗在貞觀四年（六三〇）詔顏師古校訂五經，七年頒新定五經於天下。之所以需要校訂，是因爲南北各地長期傳承襲用的文本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十二年詔孔穎達等撰修五經正義，十四年撰成，初名「義讀」。隨即有馬嘉運言其編撰之失，太宗遂於十六年又詔，復加詳定，賜名「正義」。高宗永徽二年，詔長孫無忌等再次刊定，此時孔穎達已卒四年。至四年（六五三）完成，詔頒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五經

《正義》規模頗大，而主要的編纂工作，自貞觀十二年至十四年，先後僅三年。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完成編纂，是因為他們選取前代學者的現成義疏為底本，稍加調整而成。清人劉文淇撰左傳舊疏考正，詳論春秋正義中大部分內容直接襲用劉炫、劉焯所寫文字，孔穎達等人新寫的內容很少。除了春秋正義外，尚書正義、毛詩正義也都以劉炫、劉焯二人的義疏為底本，因此可以推測毛詩正義的大部分內容也因襲了劉炫、劉焯所撰。就總體而言，不妨認為孔穎達等在接受二劉學術方法的前提下，對二劉矯枉過正的偏激批評進行調整，以便作為官方定本，頒佈天下。這一點，孔穎達的序也說得很清楚：「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

《毛詩正義》的主要內容，以南北朝時期逐漸發展的義疏學說為基礎，經過隋代二劉的徹底批評以及唐初孔穎達等的綜合調整而成。如果說一部毛詩正義體現著南北朝、隋、唐初數百年間學術發展的歷程，並不過分。

（二）南北抄本的匯合與毛詩正義的完成

唐朝頒佈的毛詩正義，作為官方指定教材，廣為流傳。我們今天還能看到敦煌出土的唐抄殘本以及日本流傳的唐抄（或其轉抄）殘本（參見本書附錄圖版）。敦煌與日本，東西相隔八千里，永徽至今，時間逾千年，尚有傳本，足以見其在唐代的普及程度。然廣泛流傳，輾轉抄錄，勢必出現各種不同文本。尤其因為正義是教材，學者往往邊學邊抄，未必嚴格照抄底本，因此到宋代初期，各種抄本之間差異甚大。正如端拱元年（九八八）孔維上表所說：「講經者止務銷文，應學者唯編節義；苟期合格，志望策名。出身者急在干榮，食祿者多忘本業；一登科級，便罷披尋。因循而舛謬漸滋，節略而宗源莫究。」（見尚書正義疏本卷首。）

經過唐末、五代的動蕩時期，宋初朝廷所藏典籍文本，並不精良完好。宋太宗積極經營文化政策，希望校定各種重要典籍。開寶八年（九七五）征服南唐而得來的南方傳本在此時發揮了重要作用。馬令南唐書云：「皇朝初離五代之後，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維、檢討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讐校精審，編秩完具，

與諸國本不類。」（卷二十三歸明傳下）事實類苑引談苑云：「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經尚多謬謬，俾學官重加刊校。史館先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校左傳，諸儒引以爲證。祭酒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案據。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貞觀四年敕以「經籍訛舛，蓋由五胡之亂，天下學士率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之至也。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爲證。」持以詰維，維不能對。王師平金陵，得書十餘萬卷，分配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讎校精當，編帙全具，與諸國書不類。」（卷三十「江南書籍」條）貞觀四年顏師古校訂五經，上節已介紹，現在看到杜鎬所引唐太宗敕，更能明白唐初校訂典籍文本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南北傳本之間的巨大差異。時隔三箇半世紀之後，宋初儒臣又一次面臨南北傳本之間巨大的差距，而且仍然以南方傳本爲精良完善，是又一次南北經籍文本的大匯合。

玉海云「端拱元年（九八八）三月，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穎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板行之」（卷四十三「端拱校五經正義」條），以下記載校勘人數、刻板完成時間。結合端拱元年三月孔維上表云「臣等先奉勅校勘五經正義，今已見有成，堪雕印版行用者」（見尚書正義單疏本卷首），知端拱元年三月是孔維等完成校勘，下詔刻版的時間。查李覺傳（宋史儒林傳）記述「太宗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一事，在「王師征燕薊」、「雍熙三年（九八六）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之前，再結合上引談苑云「雍熙中，太宗以板本九經尚多謬謬」云云，則太宗勅令孔維等校勘的時間，應該在雍熙年間或更早（開寶八年（九七五）征服南唐，第二年太宗即位，改元太平興國（九七六至九八四））。至於刻版，玉海云：「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九九二）四月以獻。」此次影印的毛詩正義單疏本，卷末有北宋刊刻時相關官員銜名，與玉海所言相符。銜名首四行列「書」者四名，最後一位趙安仁，就是玉海云「國子監刻諸經正義板，以趙安仁有倉雅之學，奏留書之，踰年而畢」（同上條小字注。事亦見宋史本傳。）者。第四行以下「勘官」，第十行以下「詳勘官」，第十五行以下「再校」，都是刻版時負責校對文字的官員。「孔維都再校」之後，空一行又有「李覺都再校」，應該是因為孔維於淳化二年去世，由李覺來接管「都再校」任務。周易正義單疏本刊書銜名的形式與毛詩正義基本一致，「勘官」和「再校」的最後也都是孔維，說明初校、再校都由孔維負責。據孔維傳，孔維曾有挪用印書經費等問題，臨終前「口授遺表，以五經疏未畢爲恨」（宋史儒林傳）。孔維含恨而死，正在刊刻毛詩正義的過程中。因此，在毛詩正義之後繼續刊刻的禮記正義，單疏本

刊書銜名中已經不見孔維之名。

正如當年孔穎達編撰五經正義之後，馬嘉運指出問題，再次校訂，高宗即位之後又一次經過審訂一樣，五經正義刻版完成之後，淳化五年、至道二年（九九六）李至先後兩次申請令人覆校，到真宗即位，咸平元年（九九八）、二年又有審訂校改之舉（均見玉海同上條），這樣才算完成刊刻五經正義的工程。官方辦事的模式，幾百年不變。

毛詩正義形成之後三百多年，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傳，出現各種異本，相互之間的文本差異不小。在宋太祖征服南唐，獲得了流傳在南唐的高質量傳本之後，太宗命孔維等校訂五經正義。經過孔維等的校訂，南北各地各種抄本之間的差異被統一，隨即將此定本刻版，至淳化三年完成刻版，再經咸平元年、二年的審訂，刻本文字於是確定，以印本的形式廣泛流傳，後來出現的毛詩正義刊本及其轉抄本都以這一版本為祖本。毛詩正義經過了多年大幅度搖擺不定的青年時期，終於到達了最成熟穩定的階段。

（三）舊抄本的失傳與南宋初年的覆刻

北宋朝廷陸續校訂諸經釋文、義疏、正史等重要典籍，都由國子監、館閣等中央機構負責校訂、刻版，文本由朝廷校訂統一，刻版由朝廷管理印行，所以北宋幾乎沒有地方官衙或民間發行的版本。隨著朝廷定本的版刻印行，之前流傳的各種抄本迅速被淘汰。仁宗景祐元年（一〇三四）左右，已經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

前代經史，皆以紙素傳寫，雖有舛誤，然尚可參讎。至五代，官始用墨版摹印六經，誠欲一其文字，使學者不惑。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馬遷、班固、范曄諸史，與六經皆傳，于是世之寫本悉不用。然墨版訛駁初不是正，而後學者更無他本可以刊驗。（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七、麟臺故事、玉海卷四十三）

這並不是說有了刻本之後，學者都拿刻本來閱讀學習。因為要拿到一部印本並不容易，所以學者誦習的往往是抄本，

一直到近代，抄本的使用率還是很高。但宋代以後的抄本絕大多數是據刻本抄寫的，這一點與唐代以前不一樣。刻本不僅清晰漂亮，而且是朝廷校訂的權威定本，學者都想要找刻本抄寫。在這種情況下，舊抄本的普遍失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唐代抄本，不是敦煌、吐魯番等地方出土的，就是流傳在日本的，只有在邊遠地區特殊環境裡才幸免於毀滅。

靖康之變，北宋刻版或者毀壞，或者被金人擄去，基本全失。於是在南宋初期，出現大批主要由朝廷倡導各地官衙刊刻的覆北宋本。玉海說「紹興九年（一一三九）九月七日，詔下諸郡索國子監元頒善本，校對鏤板」（卷四十三），朝野雜記也說：「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爲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從之。」（甲集卷四）南宋最初幾年，百廢待興，朝廷無暇大舉刻書。後來大量覆刻北宋監本，可以理解爲倉促之間無法重新校訂。但也應該注意，經過北宋一百數十年的刻本時代，到此時已經沒有或極少有唐代以前的抄本流傳。此時要對這些重要典籍進行校勘，刻本只有北宋朝廷校訂的版本，抄本也不過依據刻本抄寫的，沒有唐抄本或唐抄本的轉抄本，只好拿北宋刻本直接覆刻，頂多修改明顯訛誤而已。這次影印的毛詩正義，就是紹興九年紹興府用北宋版覆刻的。因爲紹興九年以前也有各地官衙刻書的實例（如紹興二年浙東茶鹽司公使庫刻資治通鑑等），此部毛詩正義也未必是朝野雜記所述紹興九年九月詔之結果。至於王國維說「蓋南渡初，監中不自刻書，悉令臨安府及他州郡刻之，此即南宋監本也」（兩浙古刊本考、五代兩宋監本考），則此毛詩正義版片刻成後應該也歸國子監。

毛詩正義到南宋初，有了紹興九年紹興府覆刻北宋版。出現這樣一種版本的直接原因自然是靖康之變，而更重要的背景因素是北宋印行國子監刻本一百多年，唐代以來的抄本被淘汰不存，以致刻本單傳，參校無由。毛詩正義再也不能像在唐代那樣有變化的活力，紹興九年紹興府刊本代表的是成熟之後的僵化與孤寂，老化已經開始了。

（四）毛詩正義與毛詩鄭箋的結合

繼紹興府覆刻毛詩正義，約五十年之後，光宗紹熙三年（一一九二），同在紹興府的「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司」刊行了

《毛詩正義》與《毛詩鄭箋》的彙刻本，即所謂越刊八行本注疏。越刊八行本《禮記》上有紹熙三年「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黃唐寫的識語：

《六經疏義》自京監、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繹，它經獨闕。紹熙辛亥（二年）仲冬，唐備員司庾，遂取《毛詩》、《禮記》疏義，如前三經編彙，精加讎正，用鋟諸木，庶廣前人之所未備。乃若春秋一經，顧力未暇，姑以貽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

這一則非常有名的識語（圖版見中國版刻圖錄），為我們瞭解諸經注疏刊本的歷史提供了特別重要的信息。黃唐說當時流傳的六經疏義（即五經正義加周禮疏）刊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亂，覽者病焉」，就是說經注文被省略，篇章結構也被打散，不便閱讀。越刊八行本推出新的體裁，按照經文篇章，先具錄經注全文，下繫該段疏文，結構清楚，文本具備，所以「便於披繹」。原來，義疏類著作，儘管在形式上順著經注文進行說解，但並非單純以講解經注文義為目的，而是通常都要展開各種經學理論問題的討論，如上文第一節介紹。「注」要附在經文下，與經文結合為有機的一體，因此「注」無法離開經文獨立存在。義疏則與此相反，在本質上是獨立的學術著作，南北朝以來一直到南宋初，都以單獨流傳為常態。魏書、儒林傳說徐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說明北魏時期經注文本與義疏的分別成卷。事先熟讀經注文，無疑是閱讀《正義》的必要前提，正如要閱讀講解數學題的參考書，必須先將相關公式、定理理解清楚。不料南宋前期的讀者開始覺得如此學習，太過費事，想要走捷徑，跳過熟讀經注文的階段，直接去理解《正義》所講的內容。為了滿足這些讀者的需求，「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司」提供了分篇章配入經注文的新讀本。

越刊八行本的目標就是提供便於理解的義疏讀本，編輯所用底本應該是國子監刊印的單疏本和經注本。「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司」經費充足，不僅刻版漂亮，編輯校對工作也相當認真，所以後世都認為是質量最高的一系列注疏版本。越刊八行本注疏當中，《易》、《書》、《周禮》的刊刻時間較早，據昌彼得先生、張麗娟先生分析刻工時代，則大致在紹興後期到乾道年

間，而毛詩、禮記可以確定是紹熙三年黃唐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時所刊。黃唐沒能刊行的春秋，在數年之後（慶元六年（一二〇〇），由紹興府完成。在這六經當中，易、書、周禮、禮記、春秋至今都有宋版傳世，惟獨毛詩失傳。

有一部曰抄毛詩注疏殘本，曾見於經籍訪古志、留真譜，後歸楊守敬所有，今在臺灣故宮。如果這部殘抄本給我們傳達的是越刊八行本真正面貌的話，毛詩注疏的分卷、卷首題的體式等，均從經注本，而不同於單疏本。越刊八行本系列當中，書、周禮、禮記、左傳屬於一類，基本上依照單疏本的提示插入經注文，編輯體例較為單純。周易和毛詩與此不同，在分卷等細節上更多參考經注本，尤其是毛詩，經注本與單疏本的分卷法截然不同，而八行本卻依從經注本。這一問題，可以理解為毛詩正義的特殊體例所致。孔穎達等完全忽視經注本的分卷以及詩篇分組，以鄭玄詩譜為組織全書的大綱，詩篇分組用鄭玄詩譜，分卷主要以正義字數為準。因此要將毛詩正義與毛詩鄭箋合編，方枘圓鑿，必須用特殊方式處理。越刊八行本的編輯體例，具體問題相當複雜，今且不詳論。（李霖有專文待刊）

正當「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司」刊刻八行本的紹熙年間，陸游也在紹興，寫過老學庵筆記。書中記乃祖陸佃之言，曰「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可辨」（卷一）。更早成書的家世舊聞中記載的陸佃原話則更詳細：「吾治平中至金陵，見王介甫有詩正義一部在案上，揭處悉已漫壞穿穴，蓋繙閱頻所致。」英宗治平年間（一〇六四至一〇六七）王安石反復研讀的毛詩正義，應該就是北宋國子監刻本。此時王安石正當壯年（四十六歲至四十九歲，因服母喪在金陵），對毛詩本身早已經熟悉，讀毛詩正義是為研究經學理論問題，絕不是為了解毛詩經注文的參考。對這樣的讀者來說，經注本是誦讀、覈查用的，正義是研究經學理論的專著，用途本來不同。若像越刊八行本，正義當中一段一段地插入經注正文，當研讀正義時，大段的經注文顯得累贅，要誦習經注文，又被正義寸斷不成整體，豎橫不方便。到了南宋前期，大多數讀者的經學水準已經很低，都想要速成，所以插入經注文的八行本應運而生，並且大受歡迎。

毛詩正義曾經擁有王安石那樣認真研讀、真正識得箇中真味的高水準讀者，一百多年之後，已經很難獨立行走江湖，必須請經注文作搭檔，二人組才受讀者歡迎。紹熙三年越刊八行本體現的是，毛詩正義被冷落的開始。

(五) 毛詩正義與建刊附音毛詩鄭箋的結合

正當「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司」刊刻詩、禮記八行注疏本之時，遠在福建，余仁仲編刻了湯、書、詩、周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經注附釋音本。現存只有禮記、左傳、公羊、穀梁的傳本，其中只有公羊有一則題識，也是理解諸經版本源流的重要資料（圖版亦見中國版刻圖錄）：

公羊、穀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江浙諸處官本參校，頗加釐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歸含」作「哈」，「召公」作「邵」，桓四年「曰蒐」作「度」。若此者衆，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紹熙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

「紹熙辛亥」即二年，也就是黃唐到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那一年。依常理推測，編刊諸經，公羊、穀梁應該在最後，禮記等其他經書在前，不妨認為余仁仲在淳熙、紹熙年間編刊諸經。余仁仲本的特點是，將經典釋文分散插入到經注本相應段落之下，以便參考。從公羊題識看來，雖然尚無確證，分散插入釋文似乎是余仁仲的創舉。余仁仲附加釋音之後，福建書肆又附加便於學習的各種小提示，南宋中後期競相推出多種「纂圖互注」、「重言重意」類經書版本。對校禮記的余仁仲與「纂圖互注」本，可以看到「纂圖互注」本的經注、釋文與余仁仲本一致，連編輯上有特色的細節都一一吻合。據此推測，或許是余仁仲推出附釋音本，開了風氣之先，後來福建書肆在余仁仲本的基礎上發展各種增加參考信息的通俗版本。

南宋中後期福建書肆刊刻的十行本注疏，即應放在「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發展的潮流當中理解。現存南宋版十行本注疏只有三部，毛詩、左傳各一部在日本足利學校，穀梁傳一部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其餘諸經都沒有傳本，而有元代重刊本（儀禮、爾雅無十行注疏本），可借以推測南宋版的大體面貌。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十行本每卷的標題多承襲經注本的體例，而與單疏本、八行本差別較大（論語、孟子情況特殊，今不詳論）。再仔細對校毛詩、禮記、公羊十行本的經注及釋文，都與余仁仲本、「纂圖互注」本（毛詩無余仁仲本，有「纂圖互注」本。公羊有余仁仲本，無「纂圖互注」本。）高度一致。又如周禮，八行本等於以